

# 中国为什么没有率先创建经济学

黄少安

(山东大学 经济研究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摘要]科学、包括经济学的创建由人类的需要决定。自利经济人假设和资源稀缺性假设既是经济学的两个基本假设前提,也是决定经济学产生的根本因素,当人数量足够多而且个体需求和欲望足够大时,资源稀缺度自然也足够高,于是经济学就会产生;西方大航海时代的地理大发现推动了贸易全球化、市场经济和工业革命,既促进了人口增长又极大地刺激了人的需求和欲望,从而加剧了资源稀缺性,于是经济学率先在西方产生和发展。而同时代中国,政府或王公贵族们依靠集权和苛捐杂税剥削众多不知道信息、没有多大欲望的老百姓,就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所以没有足够的内在动力开拓世界市场、获取财富,在对世界认知严重偏误情况下自足、自满、自大,盲目陶醉于世界大国和强国的幻想中,因此,既没有内在动力、又没有外在的国家之间的竞争压力去开启科学意义上和经济意义上的航海时代和地理大发现,因此不可能与西方同时产生经济学。没有很强烈的需要或必要创建经济科学,也许还与彼时中国没有先进教育理念指导下训练出来的科学思维有关,当它后来有必要创建经济科学的时候(人口众多并且欲望强烈的时候),经济科学已经产生并且理论体系趋于成熟。应该充分肯定中国经济学家们对经济学发展作出的贡献,对创建经济学的中国学派还需要进一步的思考。

[关键词]地理大发现;市场扩张;人类需求膨胀;资源稀缺度提高;经济学产生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24.01.009

中国历史悠久,中国人不缺智慧和思想,相对于人口总量而言,中国很需要优化资源配置。可是,中国为什么没有率先创建经济学?中国人好像不怎么关注该问题。这个问题有点类似著名的“李约瑟之谜”——中国为什么没有率先发生工业革命?也许我们可以更一般地追问:人类为什么会创建经济科学?这也是一个很少引起人们深入思考的问题,更不用说有明确答案。还可以再追问:人类为什么要创建科学?创建的第一门科学是什么、为什么?中国现在正在努力创建中国特色的经济学,这样的追问也许有助于理解中国为什么没有率先创建经济学以及中国经济学家们如何在经济科学的发展中有更大贡献。

作者简介:黄少安,《学术界》本期封面人物,经济学博士,著名经济学家,现任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讲席教授,兼任中国制度经济学论坛理事长和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副会长等,主要研究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农村经济等,先后获得过孙治方经济学奖、首届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奖,5次全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和山东省政府首届决策咨询奖“突出贡献奖”(特等奖)。

## 一、人类的需求强度决定经济科学的产生

人类最早有意识地认真观察、反复追问、理性思考,比较系统地阐述和表达的知识体系即科学,应该是天文学。因为人类早期的生活和生产,最日常遇到和不得不面对的现象是日出日落、白天黑夜、晴雨霜雪、风暴雷电、春夏秋冬等天气气象的变化,这些现象全面而深刻地影响着原始农业和传统农业以及当时人们的日常生活,因此,人们出于生产和社会活动强烈需要,不得不仔细观察、总结经验,在经验的基础上不得不追问为什么会这样那样,追问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理性思考、逻辑推理和构建知识体系的过程,也就是科学产生或创建的过程。可见,天文现象是最早对人类生产生活产生重要影响、人类不得不仔细观察和理性思考的科学现象,创建天文学对于人类有着巨大的现实的需要,于是,天文学应人类最早的最巨大的需要而最早产生了。由此就是要说明一个基本原理或公理:科学的产生由人类的需要决定。

经济科学的产生也应该是应人类的需要才可能产生,没有足够需要或需要强度不足时,也许人类的智力已经足够,但是经济学不会产生。我们知道,经济学是研究如何优化配置有限资源的科学,有两个最基本的假设前提:一是理性经济人假设,二是资源稀缺性假设。两个假设前提实际上也就是经济学作为科学产生的必要性或必要条件。其实这两个假设是相辅相成、相互加强的,尤其是第一个假设更具有决定性和影响力。所谓理性经济人假设,就是假定每个人都会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以满足自己的欲望或需要,也就是说,个人为什么成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个体,是因为个人有欲望、有需要或需求。可以试想,如果人口数量足够少,每个人的欲望或需求没有足够多,资源是否就相对不稀缺了?若如此,那么第二个假设就不成立了。由此可以认定,只要说明了经济学的两个基本假设,尤其是第一个假设为什么成立和何时成立,就说明了经济学为什么在哪个时代产生了。

那么,影响或决定人的需求或欲望扩张的主要因素是什么?一是既有生产能力所决定的人的消费品的数量、品种和质量及其变化率。如果人的消费品数量、品种少,质量低,而且长期不变,也不知道别人的消费品的数量、品种和质量,其欲望和需求不会有大的变化和增加。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时代即传统农业经济时代,大概属于这种状态,需求也会随着生产力的缓慢提高而慢慢变化,但是不会有突然的、飞跃式的变化。二是信息传递所导致的人与人之间消费攀比,从而导致需求和欲望的变化。信息传递速度和传递量又主要是市场交易、交通技术和信息技术决定的。因为市场交易的不仅是不同商品,而且是不同商品的信息,从而使得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之间相互知道别人在消费什么,从而促进欲望和需求增加,由此也可见市场机制的能量有多大。交通技术(例如从航海技术、汽车和火车技术到现代各种高速交通技术)和信息技术(例如从印刷技术到电报电话到互联网数字化),使得物流、人流和信息流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快、越来越频繁,对不同地区和人群的需求和欲望的刺激和提高的作用越来越大。因此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人类技术进步越快、经济越发达,欲望越多,越不能满足,从而资源稀缺度越来越高。由此我们也能够理解,为什么人类过去几千年也没有创建经济学。

## 二、地理大发现和第一次全球化强化了创建经济科学的需要

经济学什么时候产生?有两个不同说法:一个认为“重商主义经济学”的产生是经济学产生的标志;一个认为以亚当·斯密为主要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的产生,才是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创建起来的标志。后一种观点认为重商主义经济学从概念、逻辑性、知识体系的完备性等方面考察,还不够严格

的“科学”标准,更多地是一套政策主张和建议。笔者的观点是:重商主义经济学是初步的经济科学,古典经济学标志着作为相对成熟的理论体系形成了。考虑到重商主义经济学从产生以来在实践中的生命力,更加应该重视它在经济科学发展历史中的地位。

欧洲航海技术的突破导致地理大发现后,开辟和拓展了世界市场,使得欧洲商人与王权政府通过世界贸易疯狂追求货币财富,引发了以商品跨国贸易为主要内容的第一次全球化,导致两个方面的巨大变化。

一方面导致世界人口开始快速增长。统计或估算数据显示:15世纪之前世界人口增长是很缓慢的,16世纪后增长加速,尤其是18世纪后,速度更快。例如,人口总量从公元前500年到公元600年左右,花了1000多年才增加了1个亿,15世纪到17世纪几乎每100年就增加1个亿。从18世纪开始,进入几何级速度增长期,但是直到19世纪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才超过了人口增长速度,而且西欧和西方后裔国的人均增长速度大大高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其他国家。<sup>[1]</sup>可见世界人口进入快速增长的时期与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工业革命的发生和发展以及市场机制作用的普及的时期是大体一致的。我们猜想:一是与财富增长速度加快,从而促进人口扩大再生产有关,二是与世界性商品贸易和人员往来增加,从而增加了不同地区食物,尤其是粮食品种传播从而促进人口增长有关。人口的高速增长虽然也增加了财富创造能力,但是,无论如何绝对大量地增加资源需求;另一方面,又促进了人类欲望和需求的大幅度提高,几乎每个人的需求和欲望都会增加。既然人口总量增加,个人的需求也增加,资源稀缺度陡然提高就很自然合理。欧洲的人口总量不一定最多,但是人口密度很高,而且消费需求受世界贸易、工业化刺激更强,更具备产生经济学的必要,因而首先在欧洲产生了重商主义经济学也是合理的。重商主义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与地理大发现、世界市场大发展、商业资本兴起和工业革命等重大事件的产生和发展,在大的时代上和时间顺序上也是大体吻合的,并且存在因果关系。由此可以构建起航海技术突破、地理大发现、地球人口数量暴增、通过世界市场或国际贸易即发展市场经济满足日益增长的对财富的欲望、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和工业革命初期与重商主义经济学产生和发展之间的逻辑链条和实际关联。因此,可以说技术进步导致了世界市场的形成,刺激和提高了人的需求和欲望,又促进了人口数量的增加,突变式加剧了资源稀缺性。重商主义经济学应运而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从重商主义探索财富的性质和财富的源泉、如何增加财富、关注价格和国家的作为等这些问题看,也确实开始探索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了,尽管答案不一定符合后来进一步观察和分析得出的正确结论,但是,基本符合当时人们所能够观察到的直观现实,因此,也可以视为经济科学的产生,只不过是初创的、粗糙的经济学。它关于财富的真正源泉的认识、基本概念的提炼、逻辑关系的构建、知识的体系化等方面肯定不如后来的古典经济学。早期的重商主义经济学就是资本主义早期或原始积累时期的经济学,是那个时代在经济理论上的产物。

可以说,地理大发现、新航路开辟对欧洲和世界的影响是革命性的。从对经济科学产生和发展的作用看,可以说直接催生了经济科学的产生,因为它加剧了人口增长和刺激了人的需求的增长,加剧了资源稀缺,大大提升了经济科学产生的必要性。其影响或作用的机制是清晰的:首先,世界市场的开拓引发了商业革命,人们发现通过贸易可以增加国家和国民的财富,于是,有两个维度的重要作用:一是在国家的支持下一批商人积累了巨额财富,形成了新兴的也是最早的资产阶级,从此资本主义正式产生和进入其第一个时期即商业资本本位时期,完成了工业资本和整个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相对于传统农业经济时代的封建主和农民而言,商业资产阶级明显更具有活力,社会地位迅速提高;二是广大民众因为贸易的频繁和商品的信息和技术溢出效应,开阔了视野、增加了信息和刺激了需求和欲

望。其次,商业革命引发了信息革命、需求革命、工业革命,进一步促进科学技术革命,这些革命又进一步促进市场的拓展,相互作用、相互促进,欧洲和北美洲即大西洋两岸地区从此走向经济科技高速发展时期,东方大国却相对落后了,这就是所谓的东西方“大分流”。

### 三、中国为什么没有率先创建经济学

有一个问题会自然地提出:东方大国中国为什么没有率先产生经济科学?因为中国清朝时期的人口总量很大,世界占比很高。如果人口数量和人的欲望和需求都增加,资源稀缺度将快速大幅度提高,经济学就有了产生的必要。虽然市场的扩张、信息的增加和欲望需求增加,与市场能力、技术进步之间会相互促进,但是不能把人口数量简单等同于需求量和资源稀缺度。如果人口数量一定,单个人或人群的需求增加,资源稀缺度会提高。需求取决于人的本能和信息导致的攀比。什么决定需求本能和攀比?生产能力、消费品种和市场机制(既交换产品也传递信息)以及交通和信息技术本身。这种情况下,即使比较少的人口也会产生巨大的、比众多人口还多的资源消耗和消费需求,可能1千万人口的需求大于1亿人口的需求,从而资源稀缺度更高,经济学更有产生的必要和可能;如果只是人口数量增加、资源总量不变、没有市场交易和交通技术进步、人与人之间信息传递不增加,单个人的欲望就不扩大,虽然总的资源稀缺度会提高,可能发生战争或其他形式的掠夺。但是,如果扩大传统农业范围例如扩大开垦耕地,如果还有新的食物品种发现或传入,人的欲望和需求仍然在原有视野中,这种总的资源稀缺度是比较容易得到缓解的。人口会增加但是不会大幅度刺激需求从而加剧资源稀缺。在中国几千年的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体系中,根据统计或估算,虽然曾经的经济总量占全世界的比例很高,但是,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传统农业经济时代一样,人均GDP和人均财富几乎没有增长,除开少数王公贵族外,广大平民的实际生活质量提高也很有限,有些时期甚至倒退。由于人们交往少、信息少,需求和欲望不仅没有得到足够刺激,反而受到束缚和抑制。直到封建王朝的末期清朝还是如此,甚至有所加剧。所谓的“康乾盛世”实际上是统治者盲目自封的,与同期的欧洲比较,无论制度、科技、财富和财富生产能力,实际上已经很落后了,特别是统治阶层和民众基本上没有被启蒙,在观念和对自己及世界的认知方面存在严重偏差,狂妄、愚昧和无知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不知道世界的变化和拒绝接受先进的东西。清朝中晚期,由于番薯等粮食品种的传入和耕地扩张以及版图巨大和税制变革(人头税改成田亩税),人口增长很快,达到4亿多,但是生产技术没有进步,只是人口规模和生产规模的低水平扩大。加上版图大,经济总量增加,人民生活水平并没有提高,甚至是下降的,有统计或估算显示,清朝人口高峰时的GDP总量也达到高峰,占世界总量的32%,确实比例不低,可是人口却占世界的36%多,人口占比是高于GDP占比的。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研究结论也是中国经济增长远远赶不上人口增长。<sup>[2]</sup>清朝的统治者却仍然感觉自己是一个地大物博、物产丰富的泱泱大国和强国。由此我们可以理解或解释,清朝作为人口世界第一的国家也没有意识到创建经济科学的必要和可能。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也会自然地提出:为什么欧洲人而不是中国开启了促进欧洲和世界发展的大航海和地理大发现时代?其实,几乎同时代的明朝也派船队七下西洋,但是只是为了宣传和炫耀中国的国威,几乎没有经济目的、军事目的和领土扩张目的,连开拓市场、互通有无的作用都有限。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尝试给出的一套解释或一组猜想。

第一,也是直接的原因,就是政府或王公贵族们没有动力、觉得没有必要。不能说中国的王公贵族不追求财富、没有欲望,只不过他们依靠集权和苛捐杂税剥削众多不知道信息、没有多大欲望的老



百姓,就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以没有足够的内在动力开拓世界市场、获取财富;再加上中国作为东方大国,其他小国与之没有竞争,因而没有足够的外在压力要走出去获取财富。这一方面与同时期的欧洲有很大不同。当然中国当时也许科技水平已经不领先,自己发明的指南针不能转换为导航设备,但是,技术原因肯定不是主要的,如果有足够的动力和压力,即使有技术困难也能克服,因为中国当时也能跨洲跨洋远航。根本原因还是自认为是最富裕最强大的国家,无知导致自足、自满、自大,最后导致落后、被动开放和卷入全球化。

第二,也是根本上的原因,就是中国当时根本就没有开启科学意义上和经济意义上的航海时代和地理大发现的社会基础。根本上没有教育理念的革命,从而没有教育课程体系和教育内容的革命。所以才没有把大航海和地理大发现当做推动科技发展和财富积累的手段,而主要当做炫耀国力、扩大国际影响的途径。最早开启大航海时代的海上霸主是葡萄牙和西班牙,但是后起的荷兰和英国却后来居上,尤其是英国率先发生了工业革命,成为长期的世界霸主。但是,讨论大航海时代对世界发展的贡献,不能不提到意大利的贡献。由于东西方陆路贸易和地中海沿岸贸易的便利,意大利并没有过多地直接参与大航海,但是,意大利对大航海和整个欧洲现代化的贡献是巨大的甚至是根本性的。不仅许多优秀的航海家和技术人员出自意大利,许多大商人资助航海,给予人才和资金方面的支持,而且,其最早的文艺复兴运动和最早的教育革命,对意大利自己和整个欧洲的启蒙、觉醒和走向现代化,起了关键性和决定性的作用。欧洲最早的、现代意义上的也是起源性的大学——博洛尼亚大学,在11世纪诞生在意大利,最早的学科专业是医学和法学,而且非常重视逻辑学的教学。医学是要探索生命的奥秘,法学是要探索如何认识和界定人与人之间的权利关系,逻辑学对于人类构建科学知识体系具有基础性作用。一个没有逻辑学训练的民族即使具有极高的智商也很难在基础科学领域有大的建树。意大利的大学教育理念和教育体系、教育模式的革命极大地推动了欧洲教育现代化,从而推动了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和工业革命。考察和比较同时代中国的教育理念、课程体系和教育内容,可以说中国同时代的政府及其官员和广大民众,根本还没有被启蒙,连稍有远见、能够产生影响力的先进的知识分子群体都没有。因此,人们就能够理解和回答中国为什么没有率先开启科学和经济意义上的大航海时代,也能解释为什么没有率先发生工业革命——因为工业革命基于技术革命,技术革命基于科学革命,科学革命基于教育革命和人类启蒙。

与此相适应,大体上可以这样判断:像中国这样的东方大国,当她确实是世界大国和强国的时候,并没有很强烈的需要或必要创建经济科学;到了18、19世纪,中国相对衰落之时,中国客观上很需要经济学(人口众多并且欲望强烈),但是由于经济文化中心的转移,已经失去了创建经济学的资格,西方既成为经济中心,也成为经济学中心,经济科学已经产生并且理论体系趋于成熟;<sup>[3]</sup>也许还与中国没有率先树立或接受先进教育理念及其在此指导下训练出足够的科学思维有关。所以,中国的经济学至今为止主要还是学习、研究和运用西方的,包括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其他经济学理论。

人类需要经济学,更需要制度经济学,因为在自利经济人和资源稀缺前提下,要想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对资源的权利界定和对不同主体(包括政府)行为的规范极为重要,而对资源权利的界定和不同主体行为的激励和约束就构成制度。对资源所有权的界定本身就是一种资源初始配置,它是其他权利配置和交换(再配置)的前提,对所有主体行为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决定资源流动配置的秩序和效率。资源配置可谓人类的所有经济活动,如果比喻成游戏活动的话,经济学既要研究游戏规则一定前提下大家怎么玩,也要研究游戏规则本身怎么确定和要不要改变。所以,人类需要经济学的同时也就需要制度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何时何以产生?经济学说史研究者一般认为德国历史学派是制度经济

学的思想渊源或最早的制度经济学,其实这是不准确的。只能说德国历史学派为后来美国的制度经济学提供了方法论的来源,不能认定它标志制度经济学的产生。因为:第一,它并不直接分析制度本身;第二,德国历史学派的奠基者威廉·罗雪尔(Wilhelm Georg Friedrich Roscher)的代表作《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是1843年才正式出版的,远远晚于其他经济学家对制度的专门分析。真正标志制度经济学或经济学的制度分析学派产生的应该是空想社会主义经济学,如果把经济政策也视为制度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认为重商主义经济学也是制度经济学,因为它强调国家政策的重要性,并且有一套政策主张或建议。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几乎与重商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同步,都是航海大发现以后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发展在理论上的体现,也都是当时现实的产物,只不过一个关注、观察和研究现实的正面,一个关注、观察和研究现实的背面,一个是建设性的理论,一个是批判性的理论。空想社会主义者当时就已经敏锐地看到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殖民贸易等的弊端或不公平性,对其加以批判,向往并且描绘了与之不同的理想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比较标准的制度批判和制度构建的经济学。当然,它与重商主义经济学一样,在概念提炼、学理依据、逻辑关系构建和知识体系化等方面,也是粗糙的。至于在一个时代为什么会出现两个不同甚至相反的经济学理论,其实很好解释、很容易理解。因为任何一个时代都有正反两面性,就像任何一个人都有优缺点一样,即使进步是主流,也有不好的一面,不好的一面也是允许被理论家们关注、观察和研究的,而且是有利于社会进步的。

#### 四、关于经济学中国学派的思考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不仅自然科学,而且社会科学水平也会不断提高,尤其是经济学,对于人口密度很高、人口总量巨大、不断开放、发展迅速的中国而言,其实对经济科学的创新和发展的需求强度应该是极高的,现实的需要必然会推动经济科学在中国的发展。现在中国强调创建中国特色的科学和理论,也是一种自觉和自信。就经济学而言,说创建“中国经济学”如果不引起词义误会的话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为了避免可能的误会和遵循用词习惯,还是说创建“经济学中国学派”比较恰当,就像剑桥学派、弗莱堡学派、瑞典学派、奥地利学派等一样。

首先,要确认虽然经济科学没有率先产生于中国,但是,中国经济学家对经济科学的发展还是有贡献的。例如,张培刚先生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创立了农业国如何工业化的理论,是发展经济学的奠基性著作之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王亚南先生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对中国经济制度的研究,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运用,也是对它的重要发展,体现在其代表作《中国经济原理》(增订版更名为《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等之中。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界思想活跃,敢于创新,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和理论假说,比较成熟并且对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也许能够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创新性理论有以下几个方面:<sup>[4]</sup>

一是明确提出并且论证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体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可以统一或兼容的理论假说。改革的主要理论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初级阶段理论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已经提出了,中国理论家们只是确认中国现阶段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确认虽然不能说是理论上的创新,但是实践意义是巨大的,对其他方面的理论创新具有开辟道路、扫除障碍的作用。但是,提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体制可以兼容或统一,确实是非常大胆、非常重要的理论创新。为什么这样判断?众所周知: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明确否认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的,根本上没有必要通过市场机制配置资源、进行生产和分配,也就是说,认为公有制与市场机制是不能统一或兼容的;而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极力主张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

性作用,其暗含的制度前提就是私有制,或者说,他们认为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就是私有制,在公有制条件下没有市场机制或市场机制发挥不了好作用。在这一点上,西方主流经济学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其实是一致的。中国经济学家们提出并且论证公有制与市场机制可以统一,而且付诸实践,这是一个巨大的理论挑战,既挑战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挑战了西方主流经济学,仅从理论假说层面就足以称之为重大创新。如果实践最后证实了二者可以统一,而且兼容性很好,意味着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都错了,他们的理论判断被证伪了;如果实践最后不能完全证实二者的统一或兼容性不好,作为理论假说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促使人们重新思考相应的问题,可能会引发别的理论创新,为实践提供新的指导。

二是针对社会主义国家传统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如何改革的重大问题,提出并论证了“体制渐进式转轨假说”,具体内容大体包括:改革与开放并举,以开放促进改革;增量改革与存量改革并举,以增量改革促进或倒逼存量改革;先易后难地推进改革;政府在一定限度内可以以非市场化手段推进市场化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以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以政治体制稳定,从而政治和社会稳定作为经济体制转轨以及经济增长的条件。这种转轨理论与同时代针对同样问题提出的另一种理论——“华盛顿共识”或“萨克斯疗法”比较,具有更严谨的学理逻辑,而且更具有可操作性。至少至今为止的、世界范围内的改革实践事实已经证实了它更科学,这一理论不仅适用于社会主义国家体制改革,而且对任何国家、任何时代的制度变革可能都适用。古今中外的真正的制度变革其实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即使通过激进式的“革命”宣布旧制度被推翻、建立起新制度,旧制度的消亡和新制度的建立还是需要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因此,把它称之为重要理论创新是合适的。

三是为了适应农业现代化,提出并且论证了“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理论。中国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是以土地产权制度为核心的,前20年左右的主要措施是充分保障农民对土地的权益,主要是延长承包期,目标是稳定农民预期、让农民安心种地、不要短期行为,理论依据是土地集体所有权与农民家庭承包经营权分离。土地和其他资产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不是理论创新,古代就有。后20年左右主要措施还是通过稳定承包期和保障农民对土地权益,目标却发生根本性变化,不再是稳住农民不离开土地,而是为农民流转土地、离开土地创造制度性条件。因为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大量农民离开农村和农业,农业通过产业化实现现代化势在必行。为了让农民的承包地能够流转和交易,必须进一步明晰土地产权,于是依据“产权可分解”的基本理论逻辑,创造性地提出了“土地三权分置”理论,即把土地产权分为所有权、承包权(实际上是集体成员资格权)和经营权,除开集体的所有权以外,承包权和经营权都可以(不是“必须”)以不同方式流转和交易。它的理论创新点在于提出了“承包权”,从法理上它既不是所有权又不是经营权,但是,从农民的权益内容看,是类似或接近土地所有权的,因为农民本身就是集体所有者这一主体的成员,因此,农民的承包权可谓是“准土地所有权”。<sup>[5]</sup>如此,在理论上和宪法意义上既不触及改变土地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的问题,又能够充分适应农业现代化对土地流转交易的产权明晰的要求,还能够保障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益,这种尊重客观事实、正视理论矛盾和约束条件、适应发展趋势、满足发展要求的新概念,就是真正意义上的理论创新,也是经济学“妥协、让步、达成共识、形成均衡”的科学精神的体现,关键是实践中能够顺势推进农业现代化所要求的土地流转和集中。

其次,对中国的经济学研究现状要有一个理性认识。一方面,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及其中国化的研究,中国有全世界最多的研究机构和最多的研究人员,也培养了最多的学生,政策支持力度也很大,著作出版和论文发表很多,获奖成果不少,但是,我们能否非常自信地肯定现在中国学者对马克思



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水平就是世界最高的？可以肯定的是：现在年轻一代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者远远不如老一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典原著的研读和从纵横两个维度去把握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无论细节研读理解和总体掌控都还有差距。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典原著研读不够，难以理解为什么在那个时代会产生这样的理论，更不用说融会贯通和创新发展。甚至怀疑部分出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专著和发表相关论文的所谓学者，是否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当成科学？是否尊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另一方面，关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20世纪末期开始，中国水平比较高的大学的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国际化水平以极快的速度提高，无论是师资结构、课程和教材体系、教学方式、信息交流、科研合作等多个方面，都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可以说中国有一批大学和研究机构与世界顶尖大学已经相差无几。这是中国经济学家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方面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的基础。事实上也是，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包括海外归来的和本土培养的学者，都能够在国际顶尖经济学刊物发表论文。虽然还没有达到开创、引领的水平，但是至少可以认为，中国学者在既有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范式中做出了先进水平的成果。要充分肯定这种进步，因为没有这一步就难有后来的进一步。

最后，关于创建中国特色经济学的几点思考。第一，中国经济学家对经济科学的边际创新和革命性创新都是可能的。前面已经提到，在国际顶尖刊物发表论文，假定每一篇论文必须有创新才能发表，那么说明中国学者已经不断地实现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边际创新；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更有可能是革命性的，例如提出并论证的“公有制与市场机制可以统一”的理论假说。中国和世界都在变化和发展，尤其是中国的特征事实大大提高了经济理论创新的可能性。第二，需要充分尊重科学发展的规律。任何科学创新都是在既有科学知识积累的基础上进行的，有积累有传承才可能有创新，而革命性或颠覆性的创新更需要如此。通俗地说，就是必须知道前人已经做了什么、为什么那么做、做到什么程度、用什么方法做，才可能知道前人哪些做得好、做得对、做得不够、做错了，自己还能做什么、怎么做、能否否认或修正和如何否认或修正。没有好好研读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立志要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不可能实现的。没有好好研究西方主流经济学就排斥批判否定不算是科学的态度。要避免用“创建中国特色经济学”来掩盖对其他经济学知识的无知和当拒绝对别的学习的理由。不知道不可怕，因为任何人一辈子知道的都远远少于他不知道的，可怕的是不认可自己不知道。第三，正确理解“科学话语权”。科学家群体使用通用概念或用通用逻辑创建的新概念，有逻辑地阐释自然或社会现象，而且阐释得比别人好，同行不得不服，这叫“科学话语权”。不排除世界不同科学领域有学阀垄断话语权的现象，但是，从根本上说，“科学话语权”还是科研能力竞争的结果。不能把“科学话语权”理解为你们那一套话语体系我不懂也不想懂，我们另造一套话语体系，自己相互说。这不是话语权，是自言自语。第四，需要更进一步尊重科学、培养科学精神、遵守科学伦理。

#### 注释：

[1][2][英]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伍晓鹰、许宪春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

[3]黄少安：《创建以“合作”为主线的的新经济学》，《江海学刊》1997年第5期。

[4]黄少安：《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主要的经济理论创新》，《学术月刊》2019年第3期。

[5]黄少安：《从家庭承包制的土地经营权到股份合作制的“准土地股权”——理论矛盾、形成机理和解决思路》，《经济研究》1995年第7期。